



杜甫《壮游》的“逆向阅读”与其“前文本形态”蠡测*

——兼论解读文本的一种可能

孙少华

摘要:《壮游》是杜甫晚年所作五言古诗,有六部分,一百一十二句。如果采用“逆向阅读”的方式,倒序阅读该诗,同时排除杜甫未加思考、一气呵成的可能,该诗在最终写成前,应该有一个诗人在构思阶段形成的“前文本形态”。目前所见《壮游》文本,未必完全出自杜甫晚年,有杜甫在晚年据早期旧作改写并最终定稿的可能。但这种修改或写定,并不影响杜甫对司马迁《史记》风格的学习,《壮游》叙事上的“节次波澜,离合断续”,风格上的“苍莽雄直”,正是源自司马迁《史记》的写法。它恰能体现杜甫在诗歌写作、修改过程中对诗歌写作技巧的使用与调整。

关键词:杜甫;《壮游》;“前文本形态”;叙事笔法;《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6-0012-10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文本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研究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文本形态。而这种文本形态,大多经过了作者本人或者他人的各种改变,已非作者最初撰写时的“文本原貌”。这种情况下的阅读与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处于相对状态下的“流动性”阅读或研究。但这并不能说,我们彻底无法用接近“文本原貌”的方式探索“文本真相”。如果从作者本人的写作思维(例如文章的构思、结构的设想等)入手,或许能对“文本原貌”做一番管窥蠡测的工作。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已经远离作者及其所在的时代,我们对古代文本的阅读,很大程度上无法摆脱推测的成分。从后世读者的角度看,我们对文本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向,有些角度未必符合作者原意,但或者可以为解读文本提供另一种视角和思路,从而为后世的文本研

究提供新的思考。

我们研究杜诗,往往关注所见文本的文献或风格问题。但杜诗文本与其他任何文本的形成一样,都有一个文本形成之前的构思阶段,这可以算是文本写定前的“前文本形态”。从这个角度观察杜诗文本形成及其带来的叙事风格,或者会有新的思路与认识。

就叙事风格而言,刘熙载《艺概·诗概》曾对杜诗有一番评论:“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1]这是从叙事角度将杜甫五七言古诗比作司马迁《史记》,尤其是此处所言“节次波澜,离合断续”,是对杜甫古诗叙事笔法的最好评价。今读杜甫五言古诗《壮游》,颇合刘熙载之说,姑尝试论之。

收稿日期:2022-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形成、流变及其学术体系建构研究”(21&ZD252)。

作者简介:孙少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仇兆鳌《杜诗详注》将《壮游》一百一十二句分为六部分，陶道恕将其分别总结为“一、少年时期读书交游”“二、20至24岁遨游吴越”“三、25至35岁考试失败后齐赵之游”“四、困守长安及出仕生涯”“五、安史之乱与奔赴凤翔”“六、入蜀及旅夔近况”^[2]。目前一般的认识，是以《壮游》为杜甫晚年在夔州所作，显然将此诗视作杜甫一气呵成之作。不管此说是否成立，从目前所见《壮游》诗看，该诗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结构上是完整的，是一篇具有叙事色彩的五言古风。

从文本形态与诗歌阅读的角度看，该诗是从杜甫“往者十四五”写起，直至旅居夔州；但若从叙述者或作者的逻辑思维看，我们应该站在诗人“写作现场”的时间点上，沿着诗人构思诗歌的逻辑思维追溯此诗的叙事笔法。仇兆鳌曰：“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二十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间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3]1746}这揭示了《壮游》全诗的安排布局与叙事层次，对我们理解此诗极有帮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壮游》在时空、文本形成方面也有其层次性与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壮游》作于大历元年(766年)^①，杜甫时年五十五岁，距其离世不足五年。如果排除该诗出于杜甫未加思考、一挥而就的可能，那杜甫在撰写《壮游》之前，必然对如何设计、如何布局、如何撰写有一番思考。而若按照常人思维，很显然杜甫不可能在毫无思想联系的情况下，直接从《壮游》诗的中间(如吴越、齐赵)起笔^②。因此，已入暮年的杜甫写作《壮游》时，是先以眼前的人、事、景慢慢联想到往事，还是直接跳跃到诗人十四五岁的时候，再慢慢拉回到现实？如果是口述或下笔成文，无疑是后者；但若在诗歌构思阶段，似乎以前者为是，即杜甫应该是在某种外界触动之下萌生撰写《壮游》的念头，并且应该先由身边的人、事、景开始，慢慢向前追溯青少年时期的往事。在最后写成文本的时候，诗人则显然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叙述，显得较为顺畅。这样的结构安排，使得《壮游》诗歌中的叙事路线呈现出完全“逆向”的线条美：诗人的构思是由近及远，而诗歌的写法则是由远及近。这种构思

与书写思维的“逆向”而行，会造成文本的“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使得《壮游》一诗更具张力。

因此，我们就可以暂不按照目前所见诗歌的叙事结构，而是尝试按照诗人有可能的最初构思顺序(即诗歌由后至前的文本顺序)阅读文本^③，由此观察《壮游》诗歌在诗人构思阶段的原始“文本形态”。而从目前所见文本的真实样貌看，我们这种做法，是采用“逆向阅读”的方式理解文本内涵，或者更能够接近杜甫写定诗歌前的构思原意。

为研究方便，我们姑且将这种可能存在的杜甫撰写《壮游》之前的联想或者构思文本，称为《壮游》的“前文本形态”。当然，笔者再次说明，本文仅仅是提供一种阅读的视角和可能，阅读《壮游》，还可以有其他切入点，但限于篇幅与能力，笔者无法一一还原，只能立足本文，将笔者的思考胪叙于下，供同道批评。

一、“前文本形态”的提出与《壮游》文本的两大板块

《壮游》的第六部分说：

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
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
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
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
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
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
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3]1745-1746}

仇兆鳌解释：“郁郁二句，客居之况。秋风二句，客居之景。之推以下，伤己而兼以慨世，乃客居之感。托身世外，等于之推、渔父，彼瞥眼荣华，何足羨乎？必得范蠡其人，始可救乱而济时也。”^{[3]1746}据此，此节实际上写的是诗人当下的困境：生活上身患疾病、居无定所(“老病客殊方”)，政治上不得志(“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于是，诗人联想到的是退隐之介之推、渔父(“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同时又联想到后来隐退而具有安邦定国之才的范蠡。无论如何，在此部分诗歌中，诗人主要写的是自己的困顿、窘境甚至无能；而他对“侧伫英俊翔”的期盼甚至说是“空想”(毕竟这种“英俊”并非

短期内可以出现),写的又是他人的无能。“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正是诗人对时局不满而期待英才出现的真实心理状态。

如果文本进一步写下去,由第六部分的“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诗人是先想到第一部分的“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还是第五部分的“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按照“英俊翔”的思维,应该是前者;但事实上,诗人即使联想到自己年少英才,也未必敢自比为范蠡式人物(尤其是面对安史之乱这样的军事大事)。所以,站在杜甫当时的历史时间点上分析,“群凶逆未定”之后,应该接着联想到的是后者,即“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这一部分。如果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看,应该是先有“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之事,然后才有诗人“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的感慨。但从诗歌写作之前的构思阶段分析,应该是先近后远,即先由时局的危险,推向“禄山起兵”事。从诗歌结构上看,第六部分的最后两句,与第五部分的第一、二句是有逻辑联系的。

杜甫在构思完第六部分之后,虽然紧接着想到的可能是第五部分,但是此后诗人的思绪,并未再去联想《壮游》第二、三、四部分之吴越、齐赵、长安,而是想到第一部分的“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也就是说,诗人未必敢在军事上把自己比作“英俊翔”式的英雄人物,但年少时也曾有过“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之事。

当然,由于文本书写的起因比较复杂,《壮游》的构思过程或者还有多种可能性,但从《壮游》的文字看,该诗始于晚年身边琐事、然后回忆及“英俊翔”最有可能。退一步说,即使《壮游》的构思与写作起因,并非由“英俊翔”延伸下去,而是始于杜甫晚年对个人入仕经历的回忆,他也应该是由感慨自己当下的政治遭际开始,然后才会想到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的入仕起步时期。所以,笔者将杜甫构思《壮游》由第六、五、一部分开始,是符合文学构思、写作规律的。我们姑且将此作为研究《壮游》的一个切入点。

从“前文本形态”角度看,我们假定《壮游》的构思是先有第六部分,后有第五部分,最后为第一部分。目前所见文本呈现的,则是第一部

分在先,第五、六部分在后。从内容上分析,第一部分与五、六部分应该属于同一性质的板块。

这是因为,《壮游》的第一部分“先叙少年之游”^{[3]1736},与“壮”关系不大。第五部分仇兆鳌称为:“此叙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事。”^{[3]1743}第六部分为:“此叙贬官以后,久客巴蜀之故。”^{[3]1748}这个“奔赴凤翔”及“久客巴蜀”,与第二、三、四部分中的“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之“壮游”性质不同,并且也称不上“壮游”,更多的是诗人在写作时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由于这三个部分组成的板块处于《壮游》“前文本形态”的最先位置,我们姑且称其为《壮游》文本的“第一板块”;这样,与“壮游”关系最为密切的第二、三、四部分,就自然成了《壮游》文本的“第二板块”^⑤。

问题是,诗人在当时联想到时局的艰难之后,为何在“壮游”题目之下,安排了第一、五、六这三部分呢?为何与“壮游”联系起来?又为何直接将题目定为“壮游”呢?第三个问题,我们放在后文分析,现在先回答前两个问题。

结合上文的分析,在“前文本形态”下,第五、六部分主要属于杜甫构思阶段的感想和联想,第一部分“少年之游”是在诗人构思现场“跳跃”进头脑中的“英俊翔”的“副产品”,都属于“壮游”之前的心理活动;由此开启对“壮游”的想象后,才进入诗人对“壮游”文本的构思阶段。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侧伫英俊翔”,是《壮游》第一板块(第一、五、六部分)的中心句,其所谈“往者十四五”“河朔风尘起”与“小臣议论绝”,皆与此句具有形式或内容上的逻辑联系。

从文本内容的联系看,第六部分的“群凶逆未定”,与第五部分的“河朔风尘起”,关乎第四部分的最后一句“引古惜兴亡”。也就是说,杜甫构思诗歌阶段,可以由眼前的战乱想到“兴亡”,再想到自己在长安时的事情,这就是杜甫所说的“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洛阳、齐赵地近长安,故诗人的思维由长安自然会想到“放荡齐赵间”与“中岁贡旧乡”。而诗人回到故乡的交通工具“归帆”,又自然与吴越之游及“浮海航”联系起来。

这样,作为“壮游”主体的第二、三、四部分就产生了,同时第四部分最后的“引古惜兴亡”就成为这一板块的中心句。而相对于这个“壮游”主体部分而言,第一板块中的第一部分,就成了一篇近似于“序曲”性质的文本;第五、六部分则成了近似于“尾声”性质的文本。另外,第一板块的中心句“侧伫英俊翔”,与第二板块的中心句“引古惜兴亡”主旨相同;而这两个中心句,恰好成为连接《壮游》两大板块的思想纽带。

二、《壮游》第一板块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笔法

以上我们从“前文本形态”角度,对《壮游》的构思情况进行了推测。下面,我们尝试分析《壮游》文本第一板块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笔法问题。由于我们判断这三个部分都是诗人构思文本的出发点,所以必然更多具有诗人“当下”的主观叙述特征。例如,《壮游》第一部分称:

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3]1736}

从文本内容上看,前四句“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是杜甫站在“当下”的追述之辞,其中有在“当下”的总结性“判断”(如“往者十四五”与“斯文崔魏徒”,属于事情发生之后的结论,具有“当代”特征),也有对“过去”的回忆性“实录”(如“出游翰墨场”“以我似班扬”,属于当时的“实有之事”,如同史书撰写中的“史臣追书”^[4],也具有“追书”性质)。紧接着后文的“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与其将它视作杜甫的自夸之辞,毋宁视作“崔魏徒”之辈在“以我似班扬”中的具体评价内容;那么,这四句话就成了杜甫的“转述”之辞,也具有“追书”性质。最后,“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具有明显的自我评价性质,显然属于杜甫站在

“写作现场”产生的总结之辞或断语。在此,诗人的“当下”之辞,与“往者”他人的“过去”之辞就有机融合在一起,但总体上该部分诗歌体现出来的诗人的“主观性判断”较浓,从而使得文本具有“现在”与“过去”时间的交织,同时,在叙事上具有了虚实结合的特点。

这一点,在第五、六部分中也显得比较突出。例如,在第六部分中,除了“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与“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是实写,其余皆属虚写。如“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以总结之辞描写杜甫在写作当时的生活状况;“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写杜甫当时的心理感受;“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并非诗人亲见之景,而是诗人借用想象中的景物自况,写的是杜甫的感慨不遇及其对人生出路的选择;“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是用联想中的历史人物比喻现实,展示的是诗人“当下”的心理状况。其中“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显然属于诗人在写作现场非常主观的结论。

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笔法,更加突出的是诗人本人在诗歌中的形象,突出了诗歌的“当代性”与“现实性”,使得诗歌表达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种“现实性”与“主观性”,与诗歌第一段开篇所言“往者”形成强烈的“时空对比”,使文本具有多维性和层次性。如果将第六部分与第一部分放在一起读,这种感觉会尤其明显。年老多病的诗人这种站在“现在”回忆过去的写法,造成了诗歌文本的时空错位感。这是全诗给读者带来的一种无处不在的阅读体验。

第五部分也是如此。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姑且将第五部分的文字移录于此:

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
两宫各警蹕,万里遥相望。
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
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
翠华拥吴岳,貔虎啖豺狼。
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
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
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
 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
 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
 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3]1743}

在此，既然诗人最先想到的是“逆未定”“英俊翔”，那与之相关的是什么描写呢？我们看第五部分中的“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皆与“逆未定”有关；而“两宫各警蹕，万里遥相望”“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翠华拥吴岳，貔虎啖豺狼”，皆与理想中的“英俊翔”有关。这两部分描写，又属于“追书”性质，是诗人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并且是一种事后的“追书”与总结之辞。

至于“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以下至“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也具有“追书”自己身处历史现场时表现的性质，但同时也包含着诗人写作时的“当下感受”。在此，“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线索交织在一起，作者“当下”的“万民疮”心情与“当时”的感受混合在一起，给我们以很强的时空错位感。例如，“备员窃补衮”，是诗人写作时的“当下”的心理，是“现在”；而“忧愤心飞扬”，则是“当时”的心情，是“过去”；“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是站在“当下”写“过去”，“上感”与“下悯”，皆是站在“当下”总结自己当时的心理行为；“九庙焚”“万民疮”则是发生在“过去”并延续至今的“现实”；“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是写诗人在“过去”的表现，“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则是以“当下”的口吻总结过去的事情；“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是诗人在“当下”以总结口吻歌功颂德，而“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写的则是“过去”的场景。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第五部分诗歌中，既有写作现场的“杜甫”，也有诗人心中过去的“杜甫”；既有杜甫写作现场时“当下感受”的原始记录，也有杜甫对以往事件中个人行为与心理“当时表现”的回忆性追记。“过去”与“当下”时间交织，“写作现场”与“过去场景”空间交错，使得第五部分这一独立文本具有了时空的“层次性”与“复杂性”。

三、《壮游》第二板块的主题与文本层次

下面我们来看与“壮游”关系最为密切的诗歌的第二板块（即第二、三、四部分）。上文说过，第二板块的中心句是第四部分的最后一句“引古惜兴亡”；而第一板块的中心句即第六部分的“侧仁英俊翔”，又与“引古惜兴亡”主旨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壮游》的主体部分即第二板块主要描写的内容，应当与“引古惜兴亡”“侧仁英俊翔”有关。

《壮游》第二部分的“引古惜兴亡”主题更为明显：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
 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
 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
 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
 蒸鱼闻匕首，除道晒要章。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3]1737-1738}

在此，与“引古惜兴亡”有关的诗句有：“东下姑苏台”“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以及“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匕首，除道晒要章。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当然，其中，“王谢风流远”“蒸鱼闻匕首”“除道晒要章”，甚至包括勾践、秦始皇，还可以视作与第六部分提出的“英俊翔”有关。但总体上，这部分体现的是“古今兴亡”的主题，并且属于对当时风物的回忆性“记录”。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四句，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当时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但其被写下来显然是诗人晚年时的事情。值得怀疑的是，“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这种高度细节化的景物描写，似乎不是数十年后所能想象或回忆出来的诗句，应该是当时在吴地现场写下的文字。同样如此，“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则具有时间与地点

上的矛盾性：“越女天下白”属于一种概括性语句，何时何地都能产生此类表述；但“鉴湖五月凉”与“剡溪蕴秀异”，则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产生的现场感受。尤其是其中的“欲罢不能忘”一句，具有强烈的“现场感”或“时代感”，更像是出自诗人当时的现场感叹。如果杜甫漫游吴越是二十至二十四岁之间的事情^⑥，那么至其晚年五十五岁写《壮游》，时间已经过去三十余年，如何还会有“欲罢不能忘”这种具有高度“现场感”的表述？这种文辞，应该不是简单的“后世总结之辞”，而是对当时漫游中产生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笔者怀疑，第二部分中的这数句诗，有袭自杜甫壮年旧作而今已亡佚的诗歌之可能，即杜甫《壮游》的第二部分，有可能是在杜甫当年漫游吴越时撰写的旧诗基础上改写而成。结合“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分析，这数句诗歌很可能出自诗人早年的手笔。所以，王嗣奭曾称：“观其吴越齐赵之游，壮岁诗文，遗逸多矣，岂晚岁诗律转细，自弃前鱼耶。”^{[3]1747}笔者怀疑，杜甫壮岁漫游时的诗文，或许颇多“遗逸”，但也有部分诗作，可能被杜甫在晚年撰写此类回忆性诗篇时改造并取代。如果确实如此，我们会发现第二部分的诗歌中，已经具有杜甫晚年所作文本与杜甫早年所作、晚年修改并替代文本两种形式。但纵观全诗，共二十句，只有“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阆门北，清庙映回塘”四句属于较为纯粹的景物描写，其他皆属后来能够回忆或想象出来的文字。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如果本段诗歌有杜甫将旧作与新诗改写、糅合的可能，新诗比例多，而旧作多被废弃了。

第二部分中的最后四句，与开始的四句“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具有明显的后来总结成分。尤其是“到今有遗恨”，其体现出来的“当代性”更强。这就使得前后各四句，显现出与自“王谢风流远”至“除道晒要章”十句不同的文本层次与特征；其叙事笔法也就具有了“追书过去”与“总结当下”的时空交错感。

第三部分的主题，明显与第六部分的中心句“侧仁英俊翔”有关：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
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
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鸢。
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3]1740}

其中，诗人在少时被比作班固、扬雄，此时又自诩才不下“屈贾”（屈原、贾谊）、“曹刘”（曹植、刘桢），又将“苏侯”（苏源明）比作葛强；其中又有“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鸢”之事，显然与诗人提出的“英俊翔”不无关系。

此诗“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是以“当下”认识评论当时的诗人自己，“气劘”“目短”“忤下”“独辞”“放荡”“清狂”，这一系列带有很强主观色彩的评论，显然也并非当初诗人的真实形象，而是晚年杜甫心中的“青年杜甫”形象，带有一定的自嘲口吻。“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鸢”，一系列动作性词汇如“春歌”“冬猎”“呼鹰”“逐兽”“射飞”“纵鞚”“引臂”“落鸢鸢”，以及相对的景物如“丛台”“青丘”“皂枥林”“云雪冈”等，多属缺乏细节的概括性描述，都是不必在齐赵现场就可以想象或回忆出来的，并且没有纯粹的细节景物描写，故这段文字出于杜甫晚年手笔无疑。

第四部分，写诗人身居长安，直接参与“引古惜兴亡”之时：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
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
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
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
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
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
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
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
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3]1741}

这一部分与第二、三部分最大的不同，是将前面两部分中的“景点壮游”改为在社会中的

“心灵壮游”，更多的是诗人亲身经历的事情与感慨：“许与必词伯”，写与岑参、郑虔等文人交往；“赏游实贤王”，写与汝南王李璿交往；“曳裾置醴地”，写诗人奔走于上层社会的酒宴间；“奏赋入明光”写杜甫奏《三大礼赋》；“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写杜甫在朝堂所见；“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写诗人政治上的不得意；“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写诗人在杜曲与乡亲的交往，以及对岁月飞逝而一事无成的感慨；“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写诗人所见昔日豪族家庭命运的剧烈变化；“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写“明皇侈心自恣”^⑦；最后两句“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既是对上文水到渠成的总结，也是后面两部分写战乱的引子。

该诗题名《壮游》，但此处写的却是诗人在社会中的“心灵壮游”，其中有朋友乡亲之间的温情，也有政治的残酷无情，而由所见、所闻自然引出的对国运的担忧，使得全诗之“壮游”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先是十四五岁不更世事、“俗物多茫茫”的年少轻狂，接着是吴越、齐赵的“身体旅行”，接着是长安混迹社会的“精神旅行”，最后是诗人晚年的“引古惜兴亡”及其对“侧伫英俊翔”的期盼。诗题中的“壮游”，并非单纯指景物之“壮”，也不是诗人的年岁之“壮”，而是最后升华的“心灵”“思想”“精神”之“壮”。这种“壮游”，才是足以震撼人心并值得书写、记录下来文字。从这里说，杜甫《壮游》一诗的题名拟定，应该是写作完成之后的事情。

我们这样解释“壮”的含义，更有助于理解全诗的内涵。黄鹤曰：“上章，‘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故拈《昔游》为题。此章，‘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当拈《往游》为题。若作壮年之游，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耶？壮字疑误。”^{[3]1736}如果从我们对“壮”的解释去理解，黄鹤的疑惑就不成为问题了。其中黄鹤所言“壮年之游”中亦“兼及老少事”，说明与“游”并列的“壮”，也应该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这个含义，就不应单纯从字面去分析，而需要从全诗高度予以理解。在此，再补充两点：第一，《壮游》全诗都具有“过去”与“当下”的时间交织之感，是以“当下的感受”叙写“过去的事实”。客观上分析，《壮

游》第二板块中的所有叙述，实际上都具有“总结性”“主观性”的特征，包含着诗人对“当下”的期盼和反思，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时空。第二，第一板块的主旨句是“侧伫英俊翔”，第二板块的主旨句是“引古惜兴亡”。但是在第二板块中所引的“古”其实就是“英俊”，第一板块中所提到的“英俊”都是在“惜兴亡”。这两个主旨时时呼应，使得两大板块在结构和内容上的联系丝丝入扣。这是造成“壮游”足以统领全诗，同时使得“壮”这个词语具有更加丰富内涵的文本基础^⑧。

四、《壮游》叙事风格与《史记》之关系

刘熙载称赞杜诗有司马迁《史记》“节次波澜，离合断续”及“苍莽雄直之气”的特点，结合《壮游》诗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有其道理的。抛开我们假设的《壮游》“前文本形态”暂且不说，就以目前所见全诗结构而言，杜甫以“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作引子，首先介绍了自己“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的社会交往。然而紧接着，诗人并未沿着“翰墨场”这一线索写下去，而是转而描写自己“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的吴越之游，以及“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齐赵之游。这是一种与“翰墨场”的喧嚣生活完全不同的心灵旅程，给诗人与读者带来的都是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在第四部分，诗人又以“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描写自己在长安“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的文人与政治生活，以及“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的残酷现实，这又回到了与第一部分“翰墨场”相同的生活状态。在此，诗歌“节次波澜，离合断续”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写法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叙事手法非常相似。例如，《壮游》中诗人本人从“以我似班扬”到“忤下考功第”“脱身无所爱”，再到“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君臣从“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到“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再到“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国家从“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到“大军载草草，凋

瘵满膏肓”，再到“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诸如此类的个人、群体、国家命运的巨大变化，与《史记》描写的窦婴、灌夫从高朋满座到门可罗雀，再到“迁怒及人，命亦不延”^{[5]3453}的人生变化，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至于刘熙载所言杜诗似《史记》“苍莽雄直之气”，我们拟以《壮游》描写吴越之游时对历史人物的凭吊与哀叹为例，尝试分析。

“阖闾丘墓荒”“每趋吴太伯”“蒸鱼闻匕首”“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这些在《史记》中俯拾皆是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与《壮游》的思想和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与《史记》叙事完全一致的“苍莽雄直之气”。“蒸鱼闻匕首”，叙公子光以专诸刺杀吴王僚事，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事见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5]3056-3057}

《史记》叙专诸刺王僚事非常惊心动魄，而此处“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与《史记索隐》“专诸进炙，定吴篡位”^{[5]3079}塑造的专诸英雄形象，在《壮游》中则以“蒸鱼闻匕首”高度浓缩，确有刘熙载所言“雄直”之气：雄壮之历史场景中，蕴含着英雄人物的壮烈刚直形象，形成了特殊的文学风格。

《壮游》诗中的“东下姑苏台”“阖闾丘墓荒”“嵯峨闾门北”，皆与吴王阖闾有关。《杜诗详注》称：“《越绝书》：阖闾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3]1738、[5]1773}此乃《史记集解》之辞。又：“《越绝书》：阖闾冢在吴县闾门外，葬以盘郢鱼肠之剑。葬三日，白虎踞其上，号曰虎丘。”“《吴越春秋》：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闾门以通天气，复名破楚门。”^{[3]1738}阖闾破楚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5]1766}阖闾死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槁李。……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

而死。”《史记集解》引《越绝书》曰：“阖庐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渎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员之口三千，盘郢、鱼肠之剑在焉。卒十余万人治之，取土临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曰虎丘。”^{[5]1773-1774}结合“枕戈忆勾践”，可知此诗历史背景其实是叙吴越争霸事。《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吴王阖闾、夫差与勾践之间胜负恩怨的描写，可谓曲折离奇，荡气回肠。而杜甫将此历史事实高度概括，写入诗中，无疑增强了诗歌的历史厚重感与英雄情结，不凡之“气”孕育其中。

从叙事手法上看，《壮游》先叙阖闾墓，再叙吴始祖太伯让贤事，最后叙阖闾自立事。这种未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叙述，而是在叙事上形成时间错落的手法，确实有“离合断续”之效果。

再看刘熙载所说的“苍莽”之气。从《壮游》文字分析，刘熙载所说的“苍莽”，大致有将历史事件置于辽阔的地理背景，从而为英雄人物的壮烈勇敢营造特殊气氛的作用。

《壮游》写安禄山起兵部分，“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两宫各警蹕，万里遥相望。崕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与《史记》中《项羽本纪》等篇目中描写的战争场面何其相似。而“河朔”“岷山”这两个词语，本身就容易给人们以绵延万里、幅员辽阔、地势险峻、神秘莫测的联想。《宋史·地理志》记载：“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平夷无险阻。”^[6]由此可知河朔地区的广袤无垠。

岷山是长江的源头，故《荀子·子道》云：“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7]这就是说岷山有生物起源、民族发源甚至王朝龙兴的文化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会在《汉书》中看到刘向曾将西汉灭亡与岷山的自然灾害联系起来：“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靡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8]刘向这段说法，尤其增加了岷山的神圣、神秘和高深莫测。由于此事又见《汉书·成帝纪》《汉书·楚元

王传》等记载,知“岷山崩”曾入史家记录,流传颇广。反映在《壮游》诗中,在广阔无垠的河朔“风尘起”之时,唐明皇“行幸长”,避地汉家龙兴、后来又曾为西汉王朝灭亡发出预兆的岷山,这种文化信息,无疑能够给人以丰富的政治与文化想象。

另外,“两宫各警蹕,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中的“两宫”与“万里”,“崆峒”与“少海”,“杀气黑”与“旌旗黄”等,两两对比,给人以特殊的苍凉与凝重之感,“苍莽”之气喷薄而出。此类比较手法,多见《史记》记载,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破秦兵事:“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5] 393}在此,“莫敢纵兵”与“一以当十”,“从壁上观”与“呼声动天”,两两比较,诸侯军的怯懦与楚军的勇敢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而“无不人人惴恐”这一总结之辞,尤其使文字中透出一股凌厉、凝重之气。若将《壮游》中的“杀气黑”与“旌旗黄”植入《史记》此处,也是非常契合的。

以上这种“苍莽雄直之气”,给《壮游》带来了与《史记》相同或相近的历史画面感与文字震撼力,在杜甫与司马迁之间建构起了艺术上的精神桥梁。近千载而下,犹可见司马迁“史笔”在杜诗中的重现,从而强化了杜诗的“诗史”特征。刘熙载在《艺概》中称赞杜诗在叙事上学《史记》,是很有道理的。

结 语

我们阅读、研究杜诗,当然不必事事将他的诗歌向“诗史”“忧国忧民”“沉郁顿挫”上靠,但从《壮游》一诗的分析看,杜甫晚年撰写的《壮游》,的确具有非常明显的由个人到家国、由自然到社会、由生活到心灵或精神的升华意义,蕴含着诗人大半生的人生思考与智慧。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将杜甫视作“圣人”,但将杜甫简单等同于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显然也不符合杜诗的实际成就及其在唐诗中的文学地位。

从文本研究的学术意义看,《壮游》文本的“前文本形态”对当下的文本研究具有四点学术

启示:

第一,我们目前所说的文本研究,都是针对文本形成之后的“定本形态”而言,甚至是针对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的“流变形态”而言,并非文本最初形成时的“原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必然需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不能过于简单化。

第二,古代文本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本,已经很难还原其文本原貌,因此此类研究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还原”与阐释,至于与“文本原貌”“定本形态”相关的“书写”,也只能是一种相对接近的推测,很难成为“定论”。

第三,“书写”与“文本”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书写”是“文本”形成的工具与手段,离开了“书写”,“文本”无法形成;“文本”是“书写”的形式与结果,没有“文本”,“书写”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文本”与“书写”既有差异性,也有共同性。例如:“文本”有“流动性”与“不稳定性”,“书写”同样如此。“书写”在文本形成之时,主要是书写者本人或佣书者的劳动;但在文本流变过程中,后来的阅读者、阐释者、传播者的“书写”行为也会不同程度反映在文本中。所以,“文本”与“书写”是如影随形、不可分离的。

第四,“文本”与“书写”之前的“前文本形态”同样重要。“文本”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必然给“书写”研究带来很多困难;“书写”的时效性与过程性特点,也决定了“文本”研究具有多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书写”之前,也就是“文本”形成之前的“文本思维”问题。这个“前文本形态”,纯粹属于人类的思想活动,与“书写”无关,但却与“文本”有关,并且是“书写”开始与“文本”形成的关键环节。借助目前的“文本形态”,通过当时“书写”过程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大致可以对这个“前文本形态”予以尝试分析,为研究“书写”或“文本”提供另一种思考。

当然,无论是“文本”还是“书写”,都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角度、一种切入点,都可以为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开放的胸襟、宽广的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真正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学术研

究上不落后于时代,不落后于世界。

进一步看,我们目前所见的中国古代诗词文本,最初作者的构思与最终写定的文本之间,还是有区别与距离的。最初作者如何构思,今天可能很难考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做尝试性探索。这种探索,未必一定符合作者原意,但可以为我们的文本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可能。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正是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的地方,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按:黄鹤称《壮游》诗曰:“当是大历元年秋作。”参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册,第1736页。②按:关于杜甫《壮游》的构思,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身边人与事的触发。有没有可能身在夔州的杜甫首先想到的是《壮游》一诗的中间部分(即吴越、齐赵之游),然后才进一步联想到此时及之前的事情?我们认为恐非如此,因为那样就会造成《壮游》构思逻辑上的缺陷。另外,即使《壮游》最初的构思,真的始于中间部分,也不影响我们对《壮游》文本板块的划分与分析,详说见后文。③当然,即使我们假设的杜甫的这一“构思过程”不存在,也不影响我们从后至前按照倒序阅读《壮游》一诗。④按:赵次公称:“郁郁,不得

志之貌。”萧涤非等注:“困低昂,谓不能奋飞也。”蔡梦弼以为“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二句也有“喻君子见黜而不用”之意,参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册,第4102页。⑤这就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本文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即杜甫构思《壮游》,即使始于第二、三、四部分的吴越、齐赵之游,也不影响对此诗的板块划分:一、五、六为同一板块,二、三、四为同一板块;不过第一、二板块的顺序与本文有所不同而已。⑥参见陶道恕:《少陵一生的自我艺术写照——杜甫〈壮游〉试论》,《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第3-7页。⑦按:此处之解释,参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册,第1742页。⑧这两点由刘浏青清博士提醒补充,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0.
- [2]陶道恕.少陵一生的自我艺术写照:杜甫《壮游》试论[J].杜甫研究学刊,1996(1):4.
- [3]杜甫.杜诗详注[M].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 [4]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035.
-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2359.
- [7]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532.
-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1457.

A Probe into the “Reverse Reading” and “Pre-text Form” of Du Fu’s *Zhuangyou* (《壮游》)

Sun Shaohua

Abstract: *Zhuangyou* is a five-character old style verse written by Du Fu in his later years. It has 112 lines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parts. If we adopt “reverse reading” method, read the poem in reverse order, and at the same time,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Du Fu’s creation in one smooth motion, there should be a “pre-text form” formed by the poet in the conception stage before the poem is finally written. The text of *Zhuangyou* that we have seen so far may not be entirely written by Du Fu in his later years. It is possible that Du Fu rewrite and finalize it according to his earlier works. However, this revision or finalization does not affect Du Fu’s study of the style of Sima Qian’s *Shiji* (《史记》) in *Zhuangyou*. The “undulating, intermittent” in the narration and the “boundless and vigorous” in style, are precisely derived from the writing method of Sima Qian’s *Shiji*. It reflects Du Fu’s use and adjustment of writing skills in the process of poetry writing and revision.

Key words: Du Fu; *Zhuangyou*; “pre-text form”; narrative style; *Shiji*

[责任编辑/随 斋]